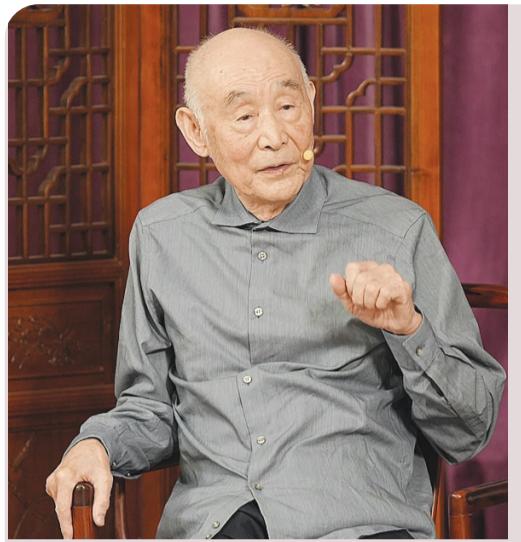


让历史学充满魅力

——冯尔康与阎崇年学术对谈共话史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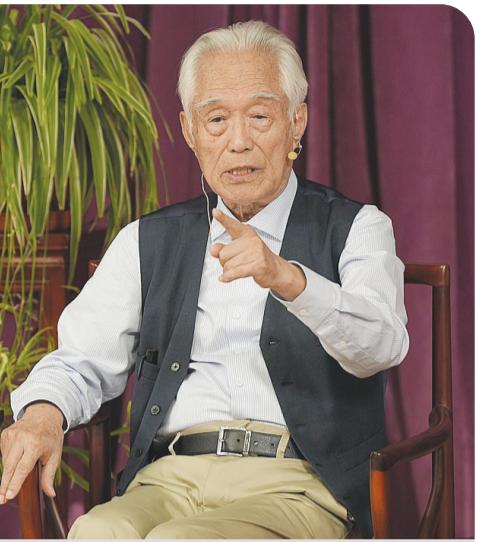
朱亦灵



冯尔康

近日，“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堂——让历史学充满魅力”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举行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二位清史学界名宿——冯尔康先生与阎崇年先生展开学术对谈，追述古今，传道解惑，堪称学林之美谈。这次对谈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、常建华教授担任导言人，两位导言人表示，本次对谈高朋满座，正是历史学魅力的体现。

历史学研究离不开探幽发微，其领域的扩大、内容的丰富、重大的发现，都离不开观念的更新、视角的转换及长年的积累。冯、阎二位先生潜心治学七十载，对此均卓有建树。导言人向二位先生请教了九个问题，寓意二位先生事业长久、学术之路长青。



阎崇年

回答一

常建华教授提问：冯先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倡导中国社会史研究，影响广泛。请冯先生谈谈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，以及发展的方向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：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悄然兴起，它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学以阶级斗争史为主线的状况，凸显了历史学的社会文化功能。这种转化符合社会进步的潮流，也使历史学从“史学危机”中走了出来，摆脱了“历史无用”的消极论调，从而步入新的繁荣时期。当下，社会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自我深化和突破，拓宽研究领域。南开史学目前已有诸如常建华教授的日常生活史、王利华教授的生态环境史、余新忠教授的医疗社会史、许檀教授的社会经济史、卞利教授的民间契约与诉讼史等研究，希望他们能继续坚持，取得更多成果。

回答二

常建华教授提问：满学在新时期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十分突出，请阎先生谈谈对满学的治学体会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：我的宗族史研究起初是跟着政治形势，对旧社会的宗族活动多有批判，但后来也认识到原先的观点不合理，不能根据某种情况、形势的需要来进行判断和论述，研究历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，这是我研究宗族史的缘起。在过程中，我比较注重通史的研究，这也是南开史学的传统。但因学识、精力有限，我主要集中在关注近当代宗亲会的研究，由此注意到海外延续至今的宗亲会现象，从而能够承担起《中国宗族通史》的清代卷与近现代卷的编写任务。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，我逐渐发现自己研究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，反映出他们的现实需求，从而体验到了“置身事内”的境界。我的研究经历使我认识到，现当代史的研究，不管是否自觉，都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“置身事内”的关系，因此研究者应树立正确态度，在需要进行现实评价时要明确褒与贬的立场。

常建华教授提问：阎先生不仅倡导满学，也提倡紫禁城学的研究，请您谈谈紫禁城学的研究意义和希望。

阎崇年先生作答：我们都曾说“清承明制”，可见明清历史有很强的延续性。而研究明清史，故宫是绕不开的地方。巧的是，我们一家四代都在北京漂泊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打工”，我小时候就听长辈多次说起故宫的辉煌壮丽。更巧的是，我在北京的家与故宫只有一街之隔，上学

时交流中出现，建立满学社会科学研究随之提上议程，我尽力推动，很快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，建立了配套的研究机构，出版《满学研究》七辑和若干会议论文集。目前，一支满学研究的队伍已基本建立起来。

回答三

常建华教授提问：冯先生在宗族史和谱牒学方面也卓有建树，请您谈谈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体会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：我的宗族史研究起初是跟着政治形势，对旧社会的宗族活动多有批判，但后来也认识到原先的观点不合理，不能根据某种情况、形势的需要来进行判断和论述，研究历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，这是我研究宗族史的缘起。在过程中，我比较注重通史的研究，这也是南开史学的传统。但因学识、精力有限，我主要集中在关注近当代宗亲会的研究，由此注意到海外延续至今的宗亲会现象，从而能够承担起《中国宗族通史》的清代卷与近现代卷的编写任务。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，我逐渐发现自己研究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，反映出他们的现实需求，从而体验到了“置身事内”的境界。我的研究经历使我认识到，现当代史的研究，不管是否自觉，都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“置身事内”的关系，因此研究者应树立正确态度，在需要进行现实评价时要明确褒与贬的立场。

回答四

常建华教授提问：阎先生不仅倡导满学，也提倡紫禁城学的研究，请您谈谈紫禁城学的研究意义和希望。

阎崇年先生作答：我们都曾说“清承明制”，可见明清历史有很强的延续性。而研究明清史，故宫是绕不开的地方。巧的是，我们一家四代都在北京漂泊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打工”，我小时候就听长辈多次说起故宫的辉煌壮丽。更巧的是，我在北京的家与故宫只有一街之隔，上学

时交流中出现，建立满学社会科学研究随之提上议程，我尽力推动，很快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，建立了配套的研究机构，出版《满学研究》七辑和若干会议论文集。目前，一支满学研究的队伍已基本建立起来。

回答五

杜家骥教授提问：二位先生已经就自己研究的专门领域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介绍，下面我想请二位先生以清史为主，谈谈自己的研究心得。我们先请冯先生讲一下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：清朝有四个重要特点。第一，清朝在君主专制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明代内阁多少还有宰相的影子，而清代的军机大臣只是皇帝的参谋，皇帝在战略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，以一人治天下，也以天下奉一人，缺乏对皇帝的制约性机制。第二，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虽然内部也有民族矛盾，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到多民族国家的发展。清朝根据各个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，实行了多元化的管理体制：在汉地实行行省制，西藏实行盟旗制，新疆实行伯克制，等等。这种管理体制的经验时至今日都值得吸取。第三，中国疆域的最终奠定是在清朝，特别是乾隆时代将版图扩张到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。第四，某些近代化的因素在清朝已经存在，例如商品经济的发达，呈现出了新气象。

回答六

杜家骥教授提问：目前对清朝帝王的研究很受关注，阎先生很早就精研努尔哈赤等清初帝王，请您介绍一下努尔哈赤、皇太极两代帝王的事迹。

阎崇年先生作答：谈到清朝的特点，冯先生说的是“果”，我说的是“因”。努尔哈赤和皇太

极两代帝王的努力，使清朝奠定统一中国的基础，使明朝已疏于管理的奴儿干地区重新被整合进大一统王朝之中，也统合了东北若干分散的部落，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。在文化上，在本民族的女真文被遗忘后，重新创制了满文，是阿尔泰语系中罕见的文字系统，成功保存了大量本民族的珍贵史料。但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清朝也存在若干问题。第一，在“首崇满洲”的政策指导下，在京畿一带圈地占房，运用行政手段直接抢夺民众资产。第二，八旗特权。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小批上三旗贵族的手中，为空前的君主专制埋下伏笔。清朝的御史基本是皇帝的奴才，再没有涌现出类似海瑞这样的人物。制度还造成八旗子弟有钱有粮，游手好闲，从而被“异化”，造成这一群体的整体腐败，从而影响到清朝的存续。第三，文字狱。清入关前就实行文字狱，杀戮儒生，入关后则注重用法律控制言论、钳制思想，这种做法是秦朝以来两千年帝制时代一以贯之的。以上三个问题积重难返，也为清朝的灭亡埋下祸根。

回答七

杜家骥教授提问：在清朝入关以后的皇帝中，最受关注的一位应该是雍正帝。冯先生在雍正帝研究的领域做了大量工作，所著《雍正传》在海内外影响很大，有请冯先生讲讲对雍正帝及其时代的见解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：我们以前谈到改革家的时候，总是谈到王安石、张居正，却谈不到雍正，可能是因为他是帝王。但我们还是要从具体的改革措施入手，对一个人做出评价。雍正的改革措施可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。第一，摊丁入亩。此后国家就不必耗费巨资统计户口，根据田地数量就可以有效征税。第二，养廉银制度。根据官员的级别发放养廉银，孟森先生便认为这是近代地方财政制度的雏形，这也是清朝“近代性”的一条体现。第三，除贱为良。如徽州的庄仆、广东的疍民等，雍正帝都允许他们脱离贱籍，三代之后就可以参加科举，有利于户籍制度的松弛和思

想、生产力的解放。这些改革的“近代性”，雍正帝未必能意识到，但客观上却产生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影响。虽然雍正帝在政治品格上比较残酷，但无妨于他作为杰出改革家的地位。

回答八

杜家骥教授提问：阎先生对清十二帝都有考察，请您谈一谈对清朝帝王的整体认识。

阎崇年先生作答：若论对雍正帝研究之全面深入、反响之巨大，目前无人能超过冯先生。我只是对天命一朝有所了解，而冯先生的雍正帝研究贯穿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十分不易，贡献甚巨。清十二帝中，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父子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，影响及于清朝后来的268年。需要指出，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在地形上以森林为主，满洲在入关前是森林狩猎文明，而不是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游牧文明，这一特征和与之相配的武勇精神对后来清朝建国有很大贡献。

清朝初期朝气蓬勃，但此后沉湎荣光。康雍乾三朝幸而有强势皇帝支撑，政权尚属稳定。但乾隆讲求“持盈保泰”，只愿顾及少数八旗贵族的利益，不思改革、振兴。随后嘉道咸三朝，其始便因白莲教起义元气大伤，随后更为外国侵略。这三帝不察已过，不求行动，更等而下之。至同光宣三朝，统治者空喊改革口号而没有实际行动，维护既得利益者，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被推翻。历史是严酷的，不改革则必失其“泰”，违反历史的规律、人民的愿望、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政权必然被历史淘汰。

回答九

常建华教授提问：请二位先生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历史学，并讲两句勉励青年学子的话。

阎崇年先生作答：学习历史就是要求真、求是、求新。中国史学历来有求真的传统，先秦时期的董狐、南史氏，都是为了记录信史不惜杀身。现在的青年学子虽不用冒这样的风险，但还是要做到治学求真务实。史学研究可以有三个目的。第一是为职业，也就是养家糊口。第二是为事业。第三是为生命。职业、事业，只有用生命来做，才能做好。我们在座很多年轻朋友都是未来的史学家，希望你们能够将史学研究作为终身的生命追求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：阎先生的话我很赞同。学习历史当以求真为基础，我的《顾真斋文丛》在取名时就有着这样的自我期许。让历史学充满魅力，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交给读者，还要和读者交朋友，不能摆学者的架子。有些人担忧史学研究的“碎片化”，在我看来，历史学就是要“碎片化”，把历史做得具体，才能更好地地与读者共享，例如我们现在关注的日常生活史。书写历史还需要个性化，才能在思想上给人启发，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创造力。我们还要关心民众关注的问题，例如生命史或生命安全史。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是福是祸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，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从司马迁、黄仁宇的例子来看，学者书写历史除了要求真，要掌握史料，要田野调查，还需要富有想象力。纸质文献也需要与图像、影像材料相互结合，才能更好地面向大众，就像当年央视的《百家讲坛》。

冯、阎二位清史大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，他们的学术人生与成长历程，见证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延续、变革与勃兴。二位年届九秩的学人共话史学，整场对话气氛热烈，内容丰富。二位先生在台上娓娓道来、妙语迭出，传递给台下聆听者的不仅是知识的浸润，更是历史学雍容气度的熏陶。

磨不平的“棱角”

清风慕竹



大中祥符八年(1015)，范仲淹登进士榜，正式开启了她的仕途之路。他很早就立下了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人生理想，因而一登场便展现出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情怀。

范仲淹起初虽在地方任职，却十分关心国家大事，每慷慨论天下事，奋不顾身。与其他不同的是，别人都是私下议论，大发牢骚，痛快痛快，而他却是公开议政，直达天庭。天圣六年(1028)，范仲淹向朝廷上疏长达万言的《上执政书》，奏请改革吏治、裁汰冗员、安抚将帅。他的万言书得到了时任宰相王曾和枢密使晏殊的赞赏，在他们的举荐下，范仲淹被召入京，任职秘阁校理，虽然这只是负责皇家图书典籍校勘和整理的职位，但却是进入朝廷权力中枢的重要一步，只要能稳扎稳打，不愁一个光明的政治前途。哪料想，范仲淹一出手就得罪了大权在握的皇太后。

天圣七年，十九岁的宋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刘太后祝寿。范仲淹认为此举甚为不妥，因为它混淆了家礼与国礼，于是他全然忘记了图书管理员的身份，上疏仁宗说：“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，但没有为臣之礼；如果要尽孝心，于内官行家人礼仪即可，若与百官朝拜太后，有损皇威。”奏疏报了上去，却没有任何回音。范仲淹干脆上书刘太后，请求她还政仁宗。原来宋仁宗13岁登基，太后刘娥以皇帝年龄尚小为名垂帘听政，现在虽然仁宗已经成人，但刘太后并没有还政的意思。不得不说，范仲淹此举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消息传出，群臣议论纷纷，都认为废后不合适。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等十余人跪伏拱殿外，请求召见，仁宗不见，派吕夷简出来解释。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，将吕夷简驳得理屈词穷、无言以对。第二天，范仲淹打算早朝之后再次与宰相谏争，可他刚走到待漏院，皇帝的诏书就已下达，命他外放湖州(今杭州淳安)任知州，即刻赴任。右司谏的椅子还没坐热乎，范仲淹便再次被贬。

接连碰壁，再硬的翅膀也应该知道收敛了吧，可范仲

淹却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，再次给大家展示什么叫“以卵击石”。

景祐二年(1035)，范仲淹在地方工作出色，升任吏部员外郎、权知开封府，相当于当上了首都的市长。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角色，平稳地干上个三年两载，很容易出将入相。然而第二年，他又将矛头对准了宰相吕夷简。他向仁宗皇帝进献了《百官图》，简单明了地标注出了哪些官员属于合班的循序升迁，哪些官员属于越序升迁、完全出于宰相的私意，尖锐地批评吕夷简把持朝政，培植党羽，任用亲信。吕夷简在朝廷深耕多年，岂能坐以待毙，他马上召集人马，给范仲淹罗列了三大罪名：“越职言事、勾结朋党、离间君臣。”斗争的结果不言而喻，范仲淹第三次被贬，这次去的地方是饶州，遥远而美丽的鄱阳湖畔。

这次出京，文武百官几乎无人敢为他送行。好友梅尧臣忍不住写了首《灵鸟赋》给他，婉转地劝说，你在朝中屡次直言，都被当作鸟鸦不祥的叫声，还是学学报喜之鸟吧，不要像鸟鸦那样报凶讯而“招唾骂于邑间”。对此，范仲淹很感激，但并不完全赞同，他回复了一首《灵鸟赋》给梅尧臣，掷地有声地表示：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

在短短的八、九年间，范仲淹因直言劝谏先得罪太后，次得罪皇帝，后得罪宰相，只论对错，不论权势，确实有点不作不死的意思，故而三次被贬，但他似乎并未从中汲取任何教训。宋仁宗后来将范仲淹重新召回朝廷后，让他主动跟依旧雄居宰相之位的吕夷简道个歉，消除隔阂，毕竟一个和谐的氛围更利于工作。范仲淹淡然地回答说：“臣乡论盖国家事，干夷简无愧也。”我向来论事对公不对私，对吕宰相没有抱歉的地方。

范仲淹一生都保持了刚直不阿的棱角，纵是宦海沉浮、历经磨难，也未曾有丝毫改变。他在留给子弟的家训

中说：“公罪不可无，私罪不可有。”意思是：一个人做官，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，不计得失利害，不怕得罪上层甚至皇帝；而个人操守，则务求清白，决不能贪赃枉法，授人以柄。

俯仰无愧，自然底气十足、棱角分明。难怪大思想家朱熹由衷地称赞，范仲淹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，是第一流的人物。这样的人，怎不令人心生仰慕？

历史随笔

“匆匆”原是“勿勿”之误

许晖

今天人们口语中的“匆匆”一词，是形容急急忙忙的样子。但其实这是一个误用了一千多年的词，正确的用法是“勿勿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勿，州里所建旗。象其柄，有三游。杂帛，幅半异。所以趨民，故趨勿勿。”“游”是旗帜的飘带，“杂帛”指杂色的装饰物；“幅半异”指半幅为红色，半幅为白色，商代的正色为白色，周代的正色为赤色，故为半赤半白之色；“趨民”指催促百姓，古代旗帜，纯色代表缓，杂色代表急，因此用“勿”这种杂色旗催促百姓赶紧聚集；“所以趨民，故趨勿勿”，因为是催促百姓的缘故，故以引申而把急遽、匆忙称作“勿勿”。

《礼记·器皿》中说：“洞洞乎其故也，属属乎其忠也，勿勿乎其欲之也。”这是讲的祭祀宗庙的时候，容貌洞然，恭敬的样子，心中属属然，忠诚的样子。东汉学者郑玄注解说：“勿勿，犹勉勉也。”即勤勤不懈的样子，盼望神来享用祭品。这个义项也是从急遽、匆忙引申而来的。

在著名的《颜氏家训》中，颜之推表达过这样的疑问：“世中书翰，多称勿勿，相承如此，不知所由，或有妄言此忽勿之残缺耳。”颜之推当然知道许慎的解释，因为紧接着就用许慎上述的话加以解说。可见今人书信结尾处常用的“勿勿”一词，古时却写作“勿勿”。比如王羲之的《草书帖》：“皇象草章，旨信送之，勿勿，当付良信。”皇象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书法家，信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皇象的草书作品，用书信寄给您了，此际匆忙，容后闲暇时再派遣好的信使前去。

到唐代时，“勿勿”和“匆匆”已经并用。杜牧《遣兴》：“浮生长勿勿，儿小且呜呜。”这是用的“勿勿”，形容浮生之匆遽，“匆匆”则用得非常常，比如牟融《送客之杭》：“西风吹冷透貂裘，行色匆匆不暂留。”

“勿勿”为什么会误写为“匆匆”呢？有两种说法：一种出自宋代学者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：“而今世流俗又妄于勿勿字中斜益一点，读为离字，弥失真矣。”另一种说法是表示急遽的“恩恩”或“忽忽”。因此明代学者杨慎在《丹铅续录》中感叹道：“好古者但知‘勿勿’而笑‘恩恩’，逐俗者又但知‘恩恩’而笑‘勿勿’，皆谓非也，是以学者贵博古而通今也。”

语词精奥